

香港文縱

——
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

盧瑋鑾著



681885



A0402226

香港文縱

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

施世筑 贈送
華僑大學圖書館藏

盧瑋鑾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名家系列・

香港文縱

作者／盧瑋鑾

封面設計／一文

主編／陳浩泉

責任編輯／章立

出版／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200號恒生銀行大廈604室

Wah Hon Publishing Co.

Rm. 604, Hang Seng Bank Bldg.,

200, Hennessy Rd. Hong Kong.

Tel. 5-8919810

印刷／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

發行／藝美圖書公司（經銷書店）

香港摩利臣山道一號二樓

Tel. 5-745650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經銷百貨公司、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民裕街凱旋工商業中心8樓C座

Tel. 3-645529

版次／1987年10月初版

國際書號／ISBN 962-288-045-2

定價／港幣二十六元

13.00 3

盧瑋鑾



盧瑋鑾，筆名小思、明川、盧颺，原籍廣東番禺，在香港出生。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中文系，翌年入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獲教育文憑。一九七三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國文學。一九八一年，以「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之論文獲得碩士銜。

盧瑋鑾曾任多家中學中文教師，一九七八年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中文大學，現任中文系講師。已出版的作品有《路上談》、《承教小記》、《日影行》、《不遠》、《豐子愷漫畫選釋》及合集的《七好文集》、《七好新文集》、《三人行》等。

盧瑋鑾並從事文學研究工作，多次出任文學獎評判及參與各種文學活動。

序

黃繼持

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或退一步講，對這個論題的關注，多年來有起有伏，若亡若存。關注之起，每因時代的契機；卻往往沒有持續下去者，若不徒歸因於時勢之轉移與契機之消失，便可能由於這門學科內含的困難與障礙，一時沒能跨越，於是塵步維艱了。

更遠的不說，即以七十年代為例，在學生運動、社會思潮騰躍的時勢中，香港文學綜覽及文學史探究，確曾引發某些文藝青年乃至一般文化人的熱忱，並稍能衝破那圍繞這個論題的拘束與禁忌。然而那份熱忱，大抵與當時的社會實踐（如果意識的「投入」也算是一種實踐的話）密切相關。這當然有其可貴可敬的一面，但因此也未顧及把這個論題充份「學術化」。學術研究所必需的冷靜的心態與持續的耐力，其中包括資料搜羅判斷的細密工夫，遠非一時意興所能替代。何況說不定哪一刻竟又意興闌珊？

到了八十年代，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契機，香港又成為各方觸目的焦點，香港文學也順帶再一度得到關注。此固因「本地意識」之提高，關注卻還來自隔河（深圳河）隔海（台灣海峽）的文藝界、學術界。這自然成為對本地文化人士的一種策勵。文學創作是一方面，文學研究（包括文學史研究）也是不應忽略的一方面。前者茲暫不談。關於後者，是否可借此新的契機，把以往斷斷續續的線索貫串起來，開展下去，逐步克服這門學科的內在困難，以期寫出不只一部《香港文學史》？

然而《香港文學史》遲遲未能出現。行內人認為最有資格寫這题目的盧瑋鑾（小思）女士，在這裏貢獻給讀者的，僅是文學史的一鱗半爪，或是文學史的部份準備工作。甚且她謙稱這不是「史」的撰作，僅是「史料」的整理。即使我們不便違逆她的自我估量，但她這部份史料性工作，其實對「史」的研究與撰述，掃除種種色色的障礙，打下十分堅實的基礎，是作為一門「學術」建設最少的工作。

這本書所提供的，是五十年代以前在香港的文學活動的一些片段，主要關於中國內地作家南來的蹤跡，也連及本地文人的一些活動。雖然這屬於「現代」文學史範圍之內；對作者來說，則是前代文人的遺蹤，其尚存者也多隱退經年，似乎因對象的「距離」而有助於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誠然，對前代人的研究，比之對同代人的研究，或可稍免於「同處局中」的人事牽纏、情面拘忌、習見不察、視近不明的種種蔽礙；但前代與同代也畢竟有絲絲縷縷的關連，何況中國政治鬥爭的複雜情勢、香港政府統治的微妙手段，或現或隱地貫穿着二十年代以來在港的種種文化活動。史家揭示真相，既須不受個人成見所拘，也需有不計較現實利害的勇氣。勇氣與有力的發言權，來自對大量史實之掌握。本書作者對史料的尋索，廣博精微，結合中國的史學傳統與日本的資料學方法，不徒駑駘繡出，兼且金針示人。就在這個可覆覈可檢證的研究成果上，其有論斷，每能祛疑去障，以學術的「客觀性」超越政治因素或意識型態的偏倚。書中論及抗日戰爭初期香港文藝界情況，即其一例。這種方法，若進而用於五六十年代香港文藝局面，必也大有可觀。

或許有人認為文學活動史不就象於文學史。文學活動史無寧是社會文化史的一部份。但若云文學史只論文不論人，純文藝論者雖曾有此主張，其實是行不通的。知人以衡文，文之與人，不離不即，

不一不二，作為散文家的小思，豈有不知之理？此書中多篇考察作家活動，類皆因「述」以原「心」。為免浮想蹈空，故須窮究其「述」，文述著而文心遂昭。於是寫蕭紅，筆致嚴謹中不乏情韻；寫戴望舒，史料整飭以辨申志行。凡此皆為評文修史所不可少的步驟。列傳積聚而成史事的橫幅。可寫的當然不只此數人，但規範既立，後繼者自然不便苟且了。

作者自己的序言中，卻一再聲言沒有把「修史」當成工作目標，理由之一據云是史料還未齊備。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通盤工作，應待致力者尚多。香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五十年代之前後當然都是如此。不過五十年代之前，具有「個性」的香港文學尚未具體形成，因此「在香港」的文學往往只是內地文學因時處變的直接延申。可惜目前多部現代中國文學史著述，都沒能夠估計在港文學活動的份量。這未必出於偏見，極可能由於史料不備。一九三七至四一與一九四六至四九，內地作家南來的兩段高潮，僅能叙其輪廓，更莫說香港本地人的文藝活動了。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部份研究工作，看來主力還該由香港學界擔當。寫好這一部份，對五十年代以來逐漸發展出「香港個性」的香港文學史之撰述，無疑是不可缺少的準備與參照。這門學科內含的困難，將因史料的建設，而得到部份克服。則盧瑋鑾女士開山闢路之功，嘉惠繼來者匪淺；而她不肯以「修史」自任，便未免小覷她自己工作的增值力了。

當然，「修史」可以有許多層級，不能一步即躋登絕頂；史料的探求，也的確漫漫長路，似乎難以到頭。這些工作都要依賴更多同道，包括個人與團體的協力。所幸近年已有一定的回應，加上時代的機緣，與小思女士「欽才以成學」的心態，這一門學科初步建立，大抵可無退轉之憂了吧！則此書雖然只是作者部份工作的「報告」，善用者觸處皆寶，善讀者更可悟出無量法門，即使泛覽者也為其

繁富的材料與縝密的推證所懾服。

雖然「史」尚未修成，但已讓人看到可喜的勢頭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

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講師盧瑋鑾（小思）女士近十年來研究香港文學的心血結晶，內容是五十年代以前香港的文化活動，其中包括兩個主要的文藝團體及陶行知、茅盾、蕭紅、豐子愷、戴望舒等名作家在香港的文學活動。

黃繼持在「序」中說：盧瑋鑾女士謙稱這不是「史」的撰作，但她這部份史料性工作，其實對「史」的研究與撰述，掃除種種色色的障礙，打下十分堅實的基礎。雖然「史」尚未修成，但已讓人看到可喜的勢頭了。

目錄

序（黃繼持） I

漫漫長路上求索者的報告——代序 1

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 9

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紀錄 20

統一戰線中的暗湧——抗戰初期香港文藝界的分歧 41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一九三八——一九四一）組織及活動 53

中國文化協進會（一九三九——一九四一）組織及活動 93

陶行知在香港 134

茅盾在香港的活動（一九三八——一九四二） 143

十里山花寂寞紅——蕭紅在香港 162

本在人間的豐子愷 171

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 176

漫漫長路上求索者的報告（代序）

前言

一九八三年八月，在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主辦第五屆「中文文學週」，我以〈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為題作了演講後，得到不少反應，前輩、朋友和對這研究課題感興趣的學者給我鼓勵和意見①我都一一領受了。但這七八年來，以公餘時間，埋首故紙堆中，究竟做了些甚麼，我也想該找一機會「結算」一下，一來檢討自己走了多少路，二來好向關心這項研究的朋友作一概要的交代，三來希望引起更多有心人的注意，趕快及時的把這項〈香港新文學史〉研究推上軌道。

史料的尋索

香港可以說是個缺乏歷史觀念的城市，外國人很早就撰寫了香港歷史專書②，但中國人反起步得遲。前輩學者如許地山、葉靈鳳、羅香林等雖然在香港史上下了功夫，但仍屬零篇斷章，也沒引起注意。到了七十年代開始，才因政治形勢起了變化，香港歷史，才得到研究者的正視，例如香港大學歷史系成立了「香港歷史研究工作坊」（HONG KONG WORK SHOP），香港大學圖書館成立「香港資料藏書」（HONG KONG COLLECTION，後命名「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香港政府成立了「資

料檔案室」，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成立了「香港資料室」等，為研究者提供了歷史資料。中文大學歷史系、社會系及教育學院也分別做了新界歷史，社會狀態及教育史的研究。林友蘭的《香港史話》，魯言的《香港掌故》，蕭國健的《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等著述，均反映了「香港史」研究正在發展中。關係整個香港命脈的歷史研究，還在艱難起步，只佔歷史小部分，又歷來不受重視的「文學史」那就更不堪說了。三十年代中葉以後，中國文化人紛紛南來，在這小島留下不少痕跡，文學史家如王瑤③，藍海（田仲濟）④都承認香港是個「文化中心」，但畢竟因資料散失，無法深入具體的說出「史」的面貌來，故國內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就把「香港地區文藝史料」，視為四個缺門之一⑤。憑着地利，在本港蒐集史料，應該比較方便，但做起來才知道並不如此簡單。

一九七七年，我開始從事一九二五至一九五〇年間文藝資料蒐集工作，但當時我只從幾個來過香港活動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回憶文字裏，找得很零碎的紀錄。究竟有多少文化人到過香港，我是一無所知的。於是我決定向下列四個方面進行細緻而廣泛的蒐集：

（一）報紙與期刊：

我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孔安道紀念館、市政局圖書館及私人所藏香港出版的報紙、期刊，全部逐頁翻檢，結果收穫相當豐富，包括：文化人來港離港的消息、訪問紀錄、文化團體組織及活動、文學作品等。

（二）來港文化人的作品、傳記、回憶錄、追悼文字：

這方面的資料雖然零碎，但仍提供了一些當年報刊沒有觸及的消息，例如侶倫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回憶文字及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

(三) 訪問曾來港的文化人，或對該段時期情況有一定了解或直接參與當時活動的前輩，取得口頭或書面的資料：

曾經接觸或訪問的有：卜少夫、陳君葆、陳殘雲、丁景唐、馮亦代、高貞白、黃藥眠、柯靈、李育中、林煥平、盧豫冬（宗珏）、侶倫、秦牧、施鰲存、翁靈文、吳紫風、吳曉鈴、吳其敏、蕭乾、徐遲、楊靜（戴望舒太太）、郁風、趙世光、鄭官哲、周鯨文、周俟松（許地山太太）等先生。

(四) 近人對此段時期的研究成果及評論：

四個方面，以這一項，收穫最少。在少量研究文字中，也往往因史料缺乏，而多錯誤評論。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的《戰時的香港文壇》即是一例。

把蒐集的資料，分類，存檔後，終於見到一個較清晰的面貌。由於三十年代中葉至四十年代末，文藝活動最為蓬勃，而文化人在港的流動情況又十分複雜，影響也較大，故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段時期。據所得資料顯示，知名的文化人來港的超過二百。這二百多人在港的活動及著作情況，在我的資料檔案中，雖然仍不算全面，但已有一個概略。而這段時期的文教團體的組織及活動，只要在報刊中出現過的資料，我也收集了。例如「中華藝術協進會」、「香港文藝協會」、「中國文化協進會」、「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香港文化座談會」（一九四五）、「中華業餘學校」、「中國新聞學院」、「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香港分會」、「全國漫畫作家協會香港分會」、「全國木刻協會香港分會」、「華南電影協會」、「文藝生活社」、「達德學院」、「持恆函授學校」、「南方學院」、「新文字學會」、「香港世界語言學會」、「香港學生文藝協會」、「香港歌詠協進會」、「華南電影工作者聯誼會」、「香港文化事業社」、「中英文文化協進會」、

「中美文化協進會」、「中蘇文化協進會」等，而其中有些團體資料的詳細，可包括了歷屆理監事名單、每月活動細項、學校組織和課程、任教者名單等。

文藝作品則多來自各報刊的文藝副刊及文藝刊物。由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期刊室所藏豐富，及多年來個人的蒐集，《筆談》、《野草》、《文藝生活》、《時代文學》、《大風》、《耕耘》、《中國作家》、《文藝青年》、《青年知識》、《小說》、《羣衆》、《正報》及各種以叢書發行形式出版的刊物，均能給我們一較全面的印象。各大報刊的文藝副刊，更是一寶藏。目前我已做了詳細目錄的文藝副刊有：

《大公報·文藝》（戰前、戰後）、《大公報·方言文藝》（一九四九）、《立報·言林》、《星島日報·星座》（戰前）、《星島日報·文藝》（戰後）、《華僑日報·文藝周刊》（戰後）、《文匯報·文藝周刊》（戰後）、《文協》（文協香港分會會刊）、《文化界》（中國文化協進會會刊）等。

以上提到的史料，大體上還算完整，當然其中有些缺漏，要追查起來，有時就得憑間接線索或靠機緣了。例如我追查蕭紅在港所寫《花狗》一文，就是例證。⑥

訂正與鈎沈

尋得所需資料是極大快樂，但有時卻會因裏面的錯誤，惹來許多麻煩。有正確日期，黑字白紙印出來的文字有時還不可靠。例如手民誤植、某些客觀原因使當時作者不能暢所欲言、作者的立場等，均造成許多只憑資料仍無法了解的問題。另外，有些當事人寫的回憶文字，可能因年代久遠，手頭又

乏準確資料，單靠個人記憶，往往出現錯漏或誤記的毛病。年份、日期、活動地點、某些事件細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一旦誤記，可能造成事實面貌的改觀。因此，把收集得來的資料，互相校核，決定那一條可信，然後加以訂正，是極重要又極吃力的工作。找到有力證據支持，訂正一條資料，當然如勝一仗，但有些卻纏繞了好幾年，還是毫無頭緒，恐怕永成懸案的，就叫人十分苦惱。例如「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戰前），出現了一同會異名」的情況，前後用過六個名稱，我在訪問當時曾參與該會的馮亦代、郁風、施蟄存諸先生時，以此為問，他們都表示根本記不起該會原來有過「異名」。又例如戴望舒曾借用「施蟄存」名字作筆名⑦，又與杜衡共用「江思」一名⑧，這都是造成研究的障礙。凡無法訂證的資料，只好作存疑論了。

至於鉤沈，可以說是蒐集資料過程中，最大收穫。許多來港的文化人，都是來去匆匆，在港期間寫下作品，一時也未必全數帶在身邊，事隔數十年，記憶也模糊了，偶然記起，也忘了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發表。這對該作家來說，應是一項損失，也是研究者的損失。我從蒐集的資料中，發現了許多未為人所知的作品，例如茅盾在港用筆名發表的雜文及補白文字⑨，蕭紅在港最後一年寫成的短篇及散文⑩，最近也為林煥平先生提供了他在香港的創作及活動年表。其餘還有許多作家的作品，能重現於今日，對研究者必有一定的幫助。

目標與希望

用了七八年時間，默默做着別人認為枯燥難耐的資料搜尋工作，我明白，這絕不是一門學問，因為這只不過是資料蒐集員的工作，只要肯花時間，加上細心，可以說識字的人都能做。同時，我也明

白這不該由一個人以公餘有限的時間獨力去做。枯坐幾天，找不到一條有關資料，或忽然發現一個資料羣，那種苦樂，真不足為外人道，而回到家裏，身陷資料卡片大海中，一時無法整理出頭緒來的苦惱，更有「以有涯逐無涯」的惘然。但我依舊做下去，就是對自己訂下的目標，堅定不移。

香港這個居住了五六百萬中國人的地方，百年來奇異而快速的發展，必須有它的歷史紀錄，也必須留下痕迹讓後人研究，所以《香港史》、《香港文藝史》必會出現，問題只在遲早罷了。「讀書豈能無史」？而「修史焉能無史料」？在史料還沒散失，（我深信在港大藏書以外，還有許多「珍品」在不同角落的私人書櫥中。）人物還未逝去前，趕快收集整理資料，正是我的工作目標。不過，在開始這項工作時，我並沒有預計原來觸及的層面那麼龐大，等到一年後，資料愈來愈多，才感到自己能力的單薄，時間的不足，可是那時已經無法「自拔」，只好硬着頭皮做下去，直到現在，卻又已達到「欲罷不能」的境地了。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把「修史」當成工作目標，一方面因為史料還未齊備，另一方面因為修史必須有識見與胸襟，我十分清楚自己沒有這些條件，但細心與耐心，還勉強可以具備，也就安心於史料工作了。

在訂正校對史料後，我想盡快羅列出來，好讓有心修史或研究者取材。可是，怎樣把這些史料公開，仍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近年來，國內有些作家或研究者來信表示想得到有關資料，我還得用公餘時間去把資料抄列和複印，然後分頭寄出。在身心皆疲的時候，不禁自問：這個義務資料供應人，能支持得多久？最佳辦法當然是把史料出版了，但這種賠本生意誰願意做？因此，我希望有一個機構，有一筆基金，有更多的人力，來負責資料蒐集及整理，多請這方面的學者提供意見。訪問當年參與其事的人，收集口述歷史資料，然後有系統的出版資料叢刊，這樣，研究者有史料可憑，《香港文

學史》就能完成，有「生機」的論文也會出現。

史料搜尋是條無盡的探索長路，我願盡一己有限之年，單薄的能力，走上這道路，但我不願意獨自一人走，也不願意把尋得的資料長久塵封在書房裏。我相信有心有力的人很多，在此默祝《香港文學史》不久就可面世。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於香港

註釋

- ① 前輩如劉以鬯先生，侶倫先生，朋友如黃繼持先生，黎活仁先生。學者如劉紹銘先生（見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時報》·《讀書豈能無史》一文）。林真先生（見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新晚報》·《從史學觀點評小思的香港新文學研究》一文）。
- ② 例如一八九五年德人歐德理牧師（REV. E. J. EITEL）就出版了《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 K.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 ③ 一九三七年英人余雅（GEOFFREY ROBLEY SAYER）出版了《H. K.: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AGE》。
- ④ 王瑤，《抗戰文藝的動向、新的情勢與新的組織》，《中國文學史稿》下冊，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頁二一九。
- ⑤ 藍海，《抗戰文藝的動態和動向》，《中國抗戰文藝史》，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現代出版社，頁三十二—六十四。
- ⑥ 上海市出版局理論研究室編《關於現代文學史編寫中的若干問題——十七院校現代文學史討論會例